

〔美〕马丁·埃本 著



安德罗波夫传

381
023
412

安德罗波夫传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尤里·弗·
安德罗波夫的生平与思想

〔美〕马丁·埃本 著
吴路明 张敦厚 沈 伟 译
杨淑英 李右铭

世界知识出版社

Martin Ebon

THE ANDROPOV FILE

The Life and Ideas of Yuri V. Andropov,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3, Printed in USA

根据美国麦克格劳—希尔图书公司 1983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伍永光

封面设计：丁品

安德罗波夫传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尤里·弗·

安德罗波夫的生平与思想

〔美〕马丁·埃本 著

吴路明 张敦厚 沈伟 译
杨淑英 李右铭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5.25 字数：113,000

1984 年 10 月第一版 198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500

书号：3003·1687 定价：0.70 元

（内部读物）

内 容 简 介

本书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安德罗波夫简历，安德罗波夫多年来发表的言论，并广泛引用苏联叛逃到西方的人员所写的回忆，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安德罗波夫的生平和思想，他的工作作风、生活习惯、各种爱好、健康状况以及言谈笑貌；分析了他对苏联国内外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对他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的内外政策动向，作了一般的估计。由于克格勃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作者以两章的篇幅专门论述了克格勃的沿革和现状，其中一些资料和看法，是比较有趣味的。作者围绕对安德罗波夫生平的叙述，旁及苏联某些著名人物和重大事件。其中尤其对于同安德罗波夫有密切关系的人和事，例如库西宁、苏斯洛夫和匈牙利事件，叙述也比较详细生动。此外，作者还简要介绍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各界人士（从美国副总统布什到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对安德罗波夫的不同看法。

本书内容广泛，资料丰富，生动具体，是研究苏联对外政策的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

本书作者马丁·埃本是美国研究国际共运的学者，对国际共运抱有资产阶级的偏见，因而书中流露某些反共思想，有些资料，也还有待于核实。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目 录

第一章	个人的作用有多大?	(1)
第二章	一级一级地往上爬	(16)
第三章	彬彬有礼的不倦工作的人	(29)
第四章	克格勃的传统	(39)
第五章	贝利亚消逝了的阴影	(56)
第六章	同匈牙利的关系	(71)
第七章	安德罗波夫型的克格勃	(83)
第八章	苏斯洛夫逝世以后	(95)
第九章	安德罗波夫选集	(105)
第十章	只有一个候选人	(111)
第十一章	清理经济	(121)
第十二章	那些美国“帝国主义分子”	(134)
第十三章	安德罗波夫的议事日程	(141)
附 录	尤里·安德罗波夫的生涯	(158)

第一章 个人的作用有多大？

一个人对他的祖国和它周围世界的历史能有多大的影响？已经成为苏联领导人的尤里·安德罗波夫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苏联在对内和对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趋势？从长远来看，安德罗波夫政权是否会在 20 世纪剩下的最后十几年使苏联成为一个更加具有侵略性或者不象过去那样具有侵略性的政治—军事势力？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具有“不可抗拒性”，正如地震和火山爆发对居民说来是一种严酷的、压倒一切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样。但是我们从过去和最近若干年的历史进程中已经看到，个别领导人的个性对历史事件确实有影响，而且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莱茨克(1834—1896)留下了一句现代格言：“历史是人创造的”。如果这句格言指的是那些个人专权和独裁的国家，那么它在很多细节方面都是十分适用的。

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定为古罗马的国教，他个人的这个决定对哲学、国政、伦理、文学、艺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可以说他个人对他以后的全部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领袖人物的个性和他们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富兰克林·D·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夏尔·戴高乐这些盟

国的领袖们正是在战争中才得以崭露头角；历史创造了他们，而他们又创造了历史。

当然，从中国古代的武士和暴君到现代的军人独裁者，非常富有戏剧性地出现于历史的篇章里；但是，许多国家也可以从暴君们肆虐之后的恢复过程中学到许多东西，正象一个健康的人体可以驱除疾病并因害过病而产生一种免疫力一样。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的暴行虽然在人们的记忆中一代比一代淡薄，但他们的暴行毕竟太严重，令人难以遗忘。德国已经有机会克服希特勒暴行的后果，发展了议会民主。在苏联，除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政时的一个短暂时期外，对斯大林的恐怖行为一直采取缄默态度，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当前的领导层，包括安德罗波夫在内，都是在斯大林时期成长起来的。

我们也看到，就在不久以前，西班牙是怎样从佛朗哥长期的独裁统治中恢复起来并在佛朗哥死后真正获得新生的。所以，个人（包括女人，例如英迪拉·甘地、果尔达·梅厄、玛格丽特·撒切尔）确实对过去和目前局势的发展进程有巨大的影响，而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同样地影响那些身居高位的个人的品性。伴随着权力而产生的是责任感、优越感、孤独感、救世主感、腐化、虚荣、恐惧、虐待狂、偏执狂和好大喜功，当然也有可能产生一种比较宽厚和积极的感情和性格。

为了弄清楚领袖个人和造就他们并形成他们个性的历史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还必须再考察一下，人民同他们选举出来的领袖，或者人民同那些把自己强加在人民头上的领袖们之间捉摸不定、然而具有重大意义的相互关系。1953年斯大林去世的时候，人们广泛而且真诚地悼念他。尽管他当政时期施行暴政，但公众的怀念之情仍旧是强烈的。即使

约瑟夫·斯大林施行暴政，或者正是因为他施行暴政，他对俄国人民的感染力是他的继承人所不曾享有的。当1982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去世时，人们对他的消失和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出现是异常淡漠的。

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罗纳德·欣利在他所著的《俄罗斯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俄国人喜欢他们的统治者具有一种带有魔力的，或者甚至是疯狂的性格”。斯大林在30年代的大规模清洗以及正好在他去世前几年的严重暴行，确实表明他的思想蜕变了，从他不信任他周围的人发展到无穷尽的怀疑，以至要求处死所有潜在的对手。仔细观察一下公众的情绪，可以使人强烈地感到领袖人物那种特殊的狂妄作风是存在的，这是一种从那些明显地带有病态心理的领袖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专横气质。这样一种领袖人物毫不怀疑自己，充满自信，他们可望在一些男男女女中一呼百应，而这些男男女女只要他们的精神负担得以减轻，便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屈从于作出的决定，追随领袖走上随便什么样的道路。这种情况当然能够在社会上到处看到；无论过去和现在，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而且全世界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都是这样。这种情况在各公司、各工会组织、各政党、甚至在任何私人或公共社团内部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

对于一个拥有2.7亿人口、辽阔国土和多民族的苏联来说，一个强有力的中心领导人物显然是至关重要的。1982年12月21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举行了它由不同民族联合成一个国家60周年纪念日的庆典。安德罗波夫在庆祝会上说，各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利益“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这种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大小国家和民族的创造力量引上统一轨道的相互联系正在产生越来越强大的

生命力”。他号召各个加盟共和国在经济上进一步联成一个整体，更好地在交通运输、资源和劳力方面齐心协力；强调要把每个加盟共和国的潜力“联合成为整个国家的潜力”。

查理士·普林士博士发现，斯大林的特殊作用在于，他是一个苏联众所公认的、独揽一切的统治者。他在《社会心理学杂志》（1945年11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心理学观点看斯大林》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对于苏联的各不同民族来说，崇拜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人’是具有极大的心理学意义的。”按民族来说，斯大林不是俄罗斯人，而是格鲁吉亚人。但是他和别人的例子都证明，正是一个被同化和归顺了头的外族人可能变得比君主还要忠君，或者“比教皇还要更象天主教徒”。德国狂热的扩张主义统治者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法国的超人拿破仑则来自科西嘉。斯大林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后来被列宁轻蔑地称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

斯大林作为一个非俄罗斯人，终身都有不安全感，可能这就是他永远感到受威胁的部分原因，他周围的人们不管如何奉承他，都不可能减轻他的疑心。在苏联和各卫星国到处都是斯大林的照片、画像和塑像。每个人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或书稿都是从引证斯大林的著作开始。苏联报纸的标题和报道经常出现斯大林的名字。但无论怎样都不能使他满足，都不能使他感到安全和满意。美国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写了一本书，叙述他的工作经历，书名是《出使莫斯科记》（1941），对斯大林执政时期采取了一种高度体谅的态度。他写道，这个政权在大规模清洗之后“在政治上和国内局势方面可能较前强大了”，因为“所有的潜在反对派都被杀掉了”。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斯大林贪得无厌的要求，就在40年代最后几年，屠杀又再次开始了。

领袖和他(她)所领导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更充分地被揭示出来。二次大战战后时期,第三世界也提供了若干这样的例子,这时殖民大国已经退出,民族领袖已经涌现。德国社会学家迪特尔·戈策研究了这种现象,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卡斯特罗、恩克鲁玛、苏加诺》(1977),叙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克瓦米·恩克鲁玛在加纳和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所起的作用。戈策研究了领袖魅力这个词的含义和它在现代条件下的运用,以及确定取得公众领袖地位的人们所应具有的某些重要品质。他告诫说,“在领袖的个性中,并不存在那种感人的非凡魅力,或者是个别政治领袖所具有的那种富有魔力的品性,领袖的魅力存在于领袖与其追随者的关系的某种特性之中。”

戈策认为“领袖魅力的相互影响”是一个领袖发挥其作用的关键。他发现,一个领袖的品质应当反映出来源自本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传统愿望的某些要素的特殊背景;除了反映上述这一点外,他还得把所有这些加以权衡,并作出新的贡献。为了研究尤里·安德罗波夫今天在苏联的潜在影响,并把它作为研究领导更迭的一部分,我们至少必须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甚至要追溯到列宁成为历史上和传奇中独一无二的人物以前的若干情况。

统治目前苏联西部地区的当年的异教徒军阀曾设法生存在罗马帝国之外。他们拒绝罗马帝国的统治,也拒绝罗马帝国强加于西欧的那种法律和组织模式。在10世纪和11世纪,基辅公国和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之间的接触频繁起来,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让他的下属接受了洗礼,希腊—拜占庭艺术和建筑开始传入俄国。没有什么东西比急剧改变西方文明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俄国的影响更大了。与此同

时，在被蒙古征服(1238—1480)之后，俄国同中欧的贸易和文化接触更为密切，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之后(1453)，使得莫斯科更多地依赖自己。莫斯科以更大的规模继承异教徒军阀的做法，这就是以征服为手段扩大权力和增加财富。

伊凡雷帝(1530—1584)的统治开创了今天的俄国，他生活在亨利八世统治英国，马丁路德领导德国和北欧进行改革，凯瑟琳·迪美迪奇统治法国和苏里曼大帝统治近东的时代。伊凡当政时期，无论从史实和传说来看，都是俄国历史上最惹人注目的、残酷的暴君统治。但即使是他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即把严厉的中央集权强加给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就可能很容易使其陷入混乱。1584年3月18日伊凡死后，鲍里斯·戈都诺夫(1551—1605)开始在费多尔沙皇的默许下实际进行统治；费多尔死后，经过密谋策划，鲍里斯当上了沙皇。他力求以“公正和坚定的统治”来管理国家，但他遇到了严重的饥荒(1601—1603)所引起的一直延续到1613年的可怕的“麻烦时期”。在这期间，还有假沙皇(第一个假季米特里和第二个假季米特里)的进攻以及波兰和瑞典军队在德国雇佣军帮助下的入侵。莫斯科的居民于1611年3月19日袭击了波兰的防卫部队，被波兰人成功地击退，而莫斯科城则几乎被火全部烧光。但是在找到一个人们公认有沙皇血统、有权继承沙皇的人物之前，一直未能恢复某种形式的继承关系。米哈伊尔(1613—1645)是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代沙皇。

戈都诺夫迷信一个国家需要拥有一个领袖这种“领袖魅力”的模式；他为了做到这一点——或者力求适合这个模式——培养自己具有这样的领袖才能。米哈伊尔沙皇不具备任何这类条件(他以钟表和喇叭进行自我消遣)。接下去的几

个继承人也不具备这些条件。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农奴，不折不扣地成了地主的财产，他们丧失了土地的主人翁感，这就大大影响了耕作效率。当17世纪莫斯科的西方邻国相互间进行拉锯战的时候，俄国只得站在一旁观望。斯捷潘·拉辛领导农民起义，失败了，被关在囚笼里，送到莫斯科，在红场杀了头。

回顾这一时期是十分引人入胜的，它充满了令人困惑的混乱，可笑的浮华虚荣，缺乏远见的权力之争。杰西·克拉克森在《俄国历史》一书中把彼得大帝后期的政权（1682—1725）看作是一个完整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他写道：“一种很少或者完全不取决于杰出人物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彼得诞生之前即已存在，它体现为：以奴役农民为基础的专制制度，完全从属于国家的教会，由国家进行指导、力图在不利的地理条件下向前发展的经济，不断地谋求扩大俄国的疆域，以及西方的礼节、习惯和较先进的文明向俄国生活的不断渗透。”而且这种早就存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是由许多人物赋予或开创的，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例如鲍里斯·戈都诺夫就是非常杰出的。

普遍认为彼得大帝是俄罗斯欧化——或者至少是现代化——的开创者，他个人就象是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化身。彼得在儿童时代就看到了克里姆林宫墙内部令人感伤的恐怖。他从来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只是访问了西欧（这次访问现在可能被认为执行了一次“调查团的使命”），后来成了一个自学成材的造船工、水手、木工和战士。彼得是俄国海军的缔造者，加上一支庞大的陆军，打败了土耳其并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伟大的北方战争”。他在大约长达20年的消耗战中打败了瑞典。当彼得凭他的经验从波斯（现在的伊朗）的混乱中看到了机会时，他转向东方，占领了巴库以及毗邻的城市和地

区。

这个处境不顺、早年的悲剧使感情受到创伤、命中注定要冒险外出进行探索性考察的青年，到过德国、荷兰和英国（较之尤里·安德罗波夫升任总书记之前走的地方还多），他至少把俄国传统的某些外表改变了。他曾为圣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奠基。毫无疑问，彼得大帝创造了历史。

女人创造历史的突出例子是叶卡特琳娜大帝（1729—1796）。^①她执政34年期间，迎合了整个18世纪欧洲知识界的启蒙倾向：伏尔泰拜访了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以及以德尼·狄德罗（他曾建议叶卡特琳娜购买艺术品）为首的法国百科全书派，在同当局及他们相互之间进行激烈的争论中，创立了百科全书派的治学传统。叶卡特琳娜把外交和军事技巧结合起来，为俄国成功地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张。她生在德国，受法国文化熏陶，但她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坚强决心的真正归化了的俄罗斯人。她的政权再次征服了波斯人企图乘机占领的巴库。

我们的叙述越是接近现代，我们就越感到一种惊人的继承性：革命前俄国存在的心理状况和行为，今天仍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这种类似之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安德罗波夫和其他的苏联领导人为什么特别强调共产党的作用，党实际上是同政府机构相平行的一个管理机构。从历史角度来看，共产党的作用相当于沙皇时代俄国贵族的作用：党的最上层相当于贵族寡头，他们有等级、特权以及公认的特殊生活方式。诚然，苏联上层人物享有的特权，其中包括出入出售消费品和进口细软物品的特殊商店，拥有豪华的汽车（包括可以超

^① 这里指的是叶卡特琳娜二世。她是继彼得一世之后被俄国贵族授予大帝称号的第二个沙皇。——译者

过莫斯科时速限制的规定行驶)、特殊的旅行权利等等，同暴发户叶卡特琳娜一世的奢侈行为有很大的不同。这位立陶宛的农村姑娘成了彼得大帝的妻子，后来又上升为沙皇，戴上一顶镶有 2,564 枚宝石的皇冠。但不管怎样，在这种政权下，可以说，没有人在掌权之后，能够长期避免作为一个“暴发户”所必然会作出的在财富或权力方面的过分为行。

即使叶卡特琳娜大帝具有法国式的自由主义思想，但也十分阴险和残酷。她曾批准起草称为 1766 年《命令》的最高法典，参与新法典的分析、增订和评论的领取薪金的委员不下 565 人，它确实是历史上最高级的官僚主义的废话公司之一。叶卡特琳娜常常阅读法国哲学家们的著作，她的《命令》反映了他们的自由主义观点。但是，当问题涉及到把俄国农奴控制在手中时，她清楚地意识到她是贵族的一员，并热衷于保持他们的特权——正如本世纪的赫鲁晓夫和安德罗波夫之流的人物必须经常意识到党的第二层官僚们的既得利益一样。

继叶卡特琳娜之后，她的儿子保罗一世(1754—1801)从 1796 年到 1801 年执政过一个很短的时期。他似乎想摒弃他所痛恨的母亲的传统。他被军官们暗杀了。他的 24 岁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继承了皇位，亚历山大试图继续推行他祖母的审慎的现代化计划。他的改革之一就是设置类似内阁的部长会议。布尔什维克革命后重新建立了外表上看起来类似的机构：开始称为人民委员会，后来则称为部长会议。亚历山大一世的个性曾经历过一系列的变化，这是俄国国内外处境的反映。从思想倾向来说，更大程度上则是由于他的瑞士导师的影响。这位沙皇开始时曾赞同欧洲联邦。亚历山大的一生既有幻想，又有失望；既有自由主义的进取精神，又有神秘主义的倒退思想。直到拿破仑入侵俄国前夕，亚

历山大还认为这位法国皇帝是他的朋友和同盟者。

当拿破仑的军队事实上占领了莫斯科，并烧毁了这座城市（即使这样，拿破仑最后还是惨败后撤），亚历山大才感到受了骗。但是他在那些由于他的援助而从拿破仑的统治下获得解放的盟友中，仍然起着制约作用。1813年，亚历山大在瑞士会见了冯·克吕德纳男爵夫人^①，他的一生从此以后成了虔诚的教徒。在俄国新增长起来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上，他倡议成立“神圣同盟”。

唐纳德·麦肯尼士·华莱士爵士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写道，“近代史上没有比亚历山大一世更富有悲剧性的人物了。”他接着写道：

“他早年所作的光辉承诺，他对犯罪行为（他父亲的被刺）的记忆，使他获得了实现他的理想的力量；他终于给俄国留下了可怕的遗产：一个在高尚的外衣掩盖下的、由侦探和秘密警察支撑的独裁政权；一个捉摸不定的继承制度；一支带有组织上不忠情绪的军队；一个武装起来的波兰，那里充满了由这位沙皇激发起来的酷爱自由的激情，然而却没有得到满足；同土耳其的争吵，使土耳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同俄国打一仗，要么蒙受俄国的侮辱；一个被官方的伪善腐蚀了的教育制度；一个毫不重视品行而一味强调正统和礼仪的教会；经济和财政形势很难从毁灭的边缘复苏；最后就是俄国的祸根——农奴制。”

但是亚历山大却培育出了一股在他当政期间一直保持沉默的力量。他为自由化所作的努力唤起了人们的希望，然而

^① 冯·克吕德纳男爵夫人（1764—1824），俄国女作家，生于拉脱维亚的里加城。她曾是俄国外交官布尔哈尔·冯·克吕德纳男爵的妻子，1908年成了虔诚教徒。——译者

这种希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俄国的边界扩张，使它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多语言的国家，这就为一个统一政权带来了风险。孤立地看，新的领地——其中包括芬兰和科鲁吉亚——是弱小的，但是它们的联合力量却使得中央统治集团必须付出代价。与此同时，部分地也由于亚历山大在一个时期宣扬自由主义，军人和知识分子上层人物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亚历山大本人和他的政权内部都充满着矛盾。农民的命运是亚·普希金的诗篇《村庄》的主题；这位沙皇感谢普希金为这一重要问题所谱写的诗篇，但是书报检查官禁止这篇诗歌公开发表。

1825年12月9日亚历山大死后，皇位空了一个短暂的时期，然后由他的兄弟康士坦丁正式主持他的三弟尼古拉（1796—1855）继承皇位的典礼。这时，革命派的上校军官们率领军队进入圣彼得堡的参议院广场，要求“康士坦丁登基和颁布宪法”。这次“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持续不到一天，但它迫使尼古拉一世刚刚登基就要宣判参与军事叛乱的革命者死刑或流放。

尼古拉在他1825年至1855年执政期间，曾谋求把改革同严厉的控制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既不能使那些潜在的改革派满意，也不能使那些主张实行严厉的专制统治的一派人满意。但是，它却在教育和文学中有所体现。教育部长S·S·乌瓦罗夫提出了“正统化、专制化、民族化”的口号。这种思想在今天苏联的一小撮狂热的右翼反对派中又在国潮，他们羡慕这种过去从来没有实现过的东西。尼古拉一世执政期间出现了一些伟大的俄罗斯19世纪作家，其中有尼·果戈里、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伊·屠格涅夫。他们象今天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那样，用各种各样的文艺手法表达他们对当局的

缺点的批评。

历代沙皇和他们统治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以下一些特点：过早地谋求实行财富和权力的平均分配；各种不同利益集团（贵族们、官僚们、军官们）的反抗；相对来说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法规、法律和其他法典以及与此同时存在的停滞保守甚至更严厉的控制。由于领导者个人的决心和能力的大小不同，确曾有过某些进展。彼得和叶卡特琳娜这两个“大帝”显然由于他们的个人品质而获得了较大的成就。彼得有粗犷的魄力，而叶卡特琳娜则长于老谋深算。

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于1855年继承了他父亲的皇位，他的一生体现了俄国当时所处的困境。从尼古拉一世执政时期开始的俄英克里米亚战争，到亚历山大执政早期以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而告结束，双方达成了和平协议。在俄国国内，除了要求实现工业化和技术进步的呼声之外，还伴随着改善农奴状况的压力。亚历山大于1861年公布了解放农奴的法律，紧接着就是改革兵役制度，改变司法和刑法法规，实行城市自治和改进内务部对警察的管理。但是，沙皇受到来自保守派和搞恐怖活动的民粹派的激进要求两个方面的压力。亚历山大被内部斗争所削弱，而且又背上了对土耳其战争的包袱，因而既疲乏又沮丧，企图摆脱一些繁忙的日常事务。

当亚历山大正准备发布一项命令，要求组织行政改革委员会时，1881年3月13日民粹派的一颗炸弹在冬宫附近他所乘坐的马车下面爆炸，他被刺杀了。后果是什么呢？钟摆再一次摆向镇压。正如欣利在《俄罗斯意识形态》一书中所说的：“无论谁如何力求公正地评价俄国温和的反对派，他们在数量上很可能超过了这个派别中的那些主张过激行动分子，但是过激分子常常对后世留下较大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他